

法兰克福学派与纳粹问题研究：批判的再考察^{*}

冯潇 张亮

[摘要] 纳粹研究是法兰克福学派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以集体项目的方式推进，是对霍克海默“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道路的一次成功践行。学派坚信德国纳粹的出现并非是孤立于西方文明发展整体之外的偶然现象，而是当时德国内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心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至新阶段的产物，这种深度介入经济、运用理性技术实现全面管理的体制不会从内部自我崩溃。值得一提的是，同样从对现代性的反思出发，相比于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对纳粹的发展趋势做出了更贴近历史事实的判断，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自身理论的科学合理性。

[关键词] 纳粹研究 资本主义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9) 12-0027-07

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给人类造成的伤痛是空前的。它不仅带来了军国侵略及民族屠杀，更使得长久以来形成的人类文明信仰一度崩塌。它的出现意味着人们一直追求和捍卫的理性启蒙精神已然走向其反面，却依然披着真理的面纱，成为禁锢大众思想的工具。纳粹究竟是什么？它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面对这些问题人们莫衷一是，其时大多数人，无论是英美列强还是第三国际都倾向于认为它是德国政党政治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也因此误判了历史发展趋势，丧失了遏制纳粹进一步壮大的良机。与前述流俗之见不同，亲眼见证纳粹发展轨迹的法兰克福学派深刻意识到，纳粹的兴起具有内在的历史根基，必须通过跨学科的协同攻关研究，方能准确定位其本质。法兰克福学派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纳粹展开长期集体研究，最终发现，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至最新阶段的产物，它是当时德国内外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心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一、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纳粹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国内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纳粹研究的分析起步较晚，直到1990年才出现了相关理论文章。^①相较于对学派大众文化思想研究的热火朝天，对纳粹领域的讨论则较为冷清。虽然数量不多，但现有成果普遍具有较高水准，特别是对学派从精神分析角度剖析纳粹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十分深入。然而该研究领域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认为学派纳粹问题研究是基于学者个人兴趣开展的发散性研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项由霍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冯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助理研究员（江苏 南京，210004）；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23）。

^① 参见张伟：《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剖析》，《探索与争鸣》1990年第1期。此处一并说明的是，本文将学派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纳粹问题研究作为同义处理。

海默牵头推进的集体攻关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为了给研究所争取到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霍克海默、诺伊曼等人与美国当局积极磋商，促成了纳粹及反犹太主义的相关研究，一时间对于纳粹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派压倒一切的工作重点。在波洛克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他要求研究所的所有成员自1943年4月1日起投入这项工作。^①可见，围绕纳粹问题的相关研究自开始起就是以集体攻关的方式来计划并执行的。霍克海默在纽约的秘书也曾描述道：“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这一共同的信念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所有人员甚至包括秘书都具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使命，它令我们生出了忠诚和一体的情感。”^②虽然从后续发展看，关于纳粹问题的观点不尽相同，但这并不妨碍学者们从共同的理论基点、理论信念出发来对其做出分析，纳粹问题研究绝不是学者各自为政开展的发散性研究。

第二，将学派对纳粹的讨论局限在心理学范畴，忽视了学派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心理学是学派纳粹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心理分析研究所正是在霍克海默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成立。研究所在接受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资助时亦明确表示，他们的研究在狭义上集中于“极权主义类型及其政治作用”“心理学研究”这两个方面，^③霍克海默、阿多诺还亲自担任了心理学研究方向的主要负责人。但心理学分析显然不能完全替代学派纳粹研究的理论全貌。批判理论家们更愿意以总体性的方式开展研究，而非对法西斯的某些孤立范畴给予片面分析。^④人们往往忽略的事实是，自霍克海默继任以来，学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而这才是“批判理论”的基础和根本。^⑤心理学分析在学派中自开始起就不是作为独立学科，而是作为学派跨学科研究的组成部分来对待和发展的。霍克海默在给马尔库塞的信中直接讲道：“我根本不相信心理学能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并说：“在计划书中我使用的心理学这个词其实是指人类学，因为这是在对立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人类理论”。^⑥他一再强调心理学分析不应脱离对人类社会的考察，而应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才能得出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研究结论。

第三，将纳粹研究与种族研究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在于资本主义批判。学派的观点与阿伦特不谋而合：纳粹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问题。^⑦在研究过程中，学派成员的血统因素常被放大，以至有学者误以为纳粹研究是学派完成其身份认同的一项独立事业，这又引出另一种错误的论点，即将学派的纳粹研究等同于犹太种族问题研究。事实上，学派学者更像是犹太人中的另类，对种族问题兴趣平平，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反应冷淡。在学者们看来，财产等级制是与资产阶级相关的，它既非犹太的也非基督的，宗教和伦理事务亦始终依附于社会，反犹太主义的研究也要围绕对资本的批判展开。事实上，学派的研究目标自始至终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纳粹研究是被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环节来对待和展开的，而种族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项目运行期间学派内外的主要争论

1943年2月，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研究所签订协议为起点，纳粹研究作为集体项目正式启动。^⑧

^① Pollock to Horkheimer, 2 March 1943. 参见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8页。

^② Interview with Alice Maier, New York, N. Y., May, 1969. See from Martin Jay,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143.

^③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第468页。

^④ *The Sage Handbook of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editor by Beverley Best, Werner Bonefeld, and Chris O' Kane, Los Angeles etc.: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8, p.800.

^⑤ 张亮：《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创新道路》，《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

^⑥ Horkheimer to Marcuse, 17 July, 1943.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7: Briefwechsel 1941-1948*,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6, S.463-464.

^⑦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骥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7-38页。

^⑧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学派的纳粹研究是以反犹太主义为名来进行的。这是因为该项目是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支持的，项目设置必须与犹太人问题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但这并不妨碍学派在研究的过程中“夹带私货”，坚守学派基本的研究方法及总体目标。在学派看来，反犹太主义不是简单的种族主义问题，作为法西斯主义研究的集中反映，它内在的含有资本主义批判的全部内容，也只有从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出发，才可能发现法西斯主义的实质。

此后，学派有步骤地制定具体的研究计划，阶段性地推出研究成果。项目展开之初，由纽约分组主攻“极权主义类型及其政治作用”，霍阿所在的洛杉矶分组则主攻心理学方向。随后，研究所还邀请了以桑德福为代表的伯克利小组就反犹主义心理学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作为所内研究的补充。^①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反犹主义研究》草稿。在1944至1945年的第二期研究计划中，纽约分部承担了重要工作，犹太人劳动委员会还为其中的“工人与反犹主义”提供了资助。这一时期研究所做了大量的访谈记录，撰写了题为《美国工人中的反犹主义》的研究报告。同时，学派希望通过心理测试社会问卷的方式开展研究，旨在证明“反犹主义、法西斯和破坏性性格之间的联系”。1945年，研究所计划开启第三期研究项目，并制定了9个子项目。同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作为集体性的纳粹研究项目戛然而止。在研究推进过程中，学派内外存在诸多争论。作为学派舵手的霍克海默积极回应外部质疑，对内部分歧却未做过多干涉。总的说来，争论集中于如何定义纳粹主义的属性、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以及是否应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这三个方面。

首先，在判断纳粹主义的性质方面，研究所与外部有着较为激烈的争论。纳粹研究是学派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阵地。霍克海默在《犹太人与欧洲》的首页就旗帜鲜明地写道：“没人能要求流亡者拿着镜子在他们获得庇护的地方照出一个制造着法西斯主义的世界。不愿意讲资本主义的人，就应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②这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将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的观点而做出的表态。如利奥波德·施瓦茨席尔德就认为对希特勒的支持更多来自中下层的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保罗·蒂里希与爱德华·海曼则直接认为法西斯主义未必具有阶级属性，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一定有重要的相关性；^③弗朗茨·伯克瑙作为研究所的奖学金获得者及前共产主义者，竟然认为“纳粹主义就是褐色布尔什维主义，就像布尔什维主义可以被称为‘红色法西斯主义’一样”。^④以上观点皆是学派无法认同的。在霍克海默看来，纳粹作为大商业的代理者，事实上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一旦出现以物质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为基础的少数统治，为了克服社会矛盾，集中的经济权力必然变成有组织的暴力机构。法西斯主义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从少数人那里夺取过来，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是竞争斗争中最关键的结果，法西斯主义是合乎（资本主义）时代的形式。^⑤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恰恰是在希特勒拉拢投靠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纳粹政党才获得了空前发展，希特勒也一再表示私有制是不可被触动的，看似大张旗鼓的计划经济事实上仍旧臣服于私人资本的控制之下。纳粹治下的德国，其资本主义实质并未改变。

其次，在学派内部，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波洛克与诺伊曼之争。波洛克将纳粹德国的性质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当时德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已大相径庭，虽然经济危机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有效的技术手段足以使现代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进行强制的总体性调节，以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新的形式度过危机。“在国家资本主义形势下……如果所有经济活动协调一致，不再通过自然市场规律，而通过有意识的计划安排来实现，那原有意义上的经济问题便不复存在……在这一制度下，只会遇到管理问题。”^⑥通过科学管理原则下的技术合理性的手段，市场经济原则将逐渐被取代。诺伊曼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自认坚持并贯彻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对抗在德

①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第472-473页。

② Max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9(8), S.115. 霍克海默是用英文写下这段文字的，在当时这种明确的表态是冒有一定风险的。

③ Joachim Radkau, *Die deutsche Emigration in den USA: ihr Einfluß auf die amerikanische Europapolitik, 1933-1945*,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Universitätsverlag, 1971, S.232.

④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第333页。

⑤ Max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9(8), S.128.

⑥ Friedrich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Arato& Gebhardt ed.,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p.78.

国处于更高因而更加危险的层面”。^①在他看来，德国的社会性质更接近于权威垄断资本主义，该制度保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功能。指令经济并没有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统治阶层也并未发生改变，“利润动机将各种机构联合在一起。但在垄断制度下，如果没有极权政治权力，就无法创造和保留利润”。^②他反对波洛克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丝毫迹象表明，德国正处于或者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状态”。^③在学派核心圈子看来，波洛克的构想虽然在论证形式上存在不足，但作为当前问题的讨论基础是有道理的。而诺伊曼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较之批判理论显得过于机械，^④并不适用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状况。

第三，在跨学科研究中是否应捍卫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主体地位引发了争论。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创造性地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学派创新特色之一。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若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则是舍本逐末，弗洛姆与学派的分歧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在研究初期，弗洛姆是学派在纳粹心理分析领域毫无争议的代表性人物，他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之间进行沟通，为学派的理论推进做出重要贡献。他认为，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的作用日渐凸显，有必要引入新的元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做进一步发展。精神分析一方面能说明“人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的愿望、本能驱动力、利益和需要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强调本能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或阶级的影响”。^⑤这就从内部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联结起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解释力。但弗洛姆的思想在发展中与研究所逐渐产生了芥蒂。他在与马丁·杰的通信中直言，与“霍克海默对此一计划的价值有不同看法”。^⑥从学派的角度看，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之所以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在于二者都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通过对力比多的研究，“弗洛伊德客观上已经从心理分析中挣脱出来，而弗洛姆和霍尼却回到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甚至把文化和社会也心理学化了”。^⑦在学派看来，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本能论自发阻止的修正运动近乎运用文化、社会心理学化的倾向来挑战、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这直接导致了弗洛姆与研究所的分道扬镳。

三、学派纳粹研究的主导性观点

在观点交锋的过程中，研究所关于纳粹问题的思路逐渐明晰起来。第三帝国的资本主义属性得到确认，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也得到进一步巩固。^⑧学派选择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学说作为纳粹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意识到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做必要的发展和补充来应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通过“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的方式引入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来对纳粹的生成本质及发展机理做准确的认识和判断。这些研究原则在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应用，逐渐发展出学派关于纳粹问题的主导性观点。

首先，纳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生性结果，在本质上仍属资本主义性质。学派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纳粹到底是什么？在其核心圈看来，纳粹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相关，是西方非理性统治倾向的最激进的样态，对纳粹的分析必须要通过“与整体的资本主义的互动”才能得以进行。从利益主

^①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Chicago: Ivan R. Dee, 2009, p.227.

^②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p.354.

^③ Neumann to Horkheimer, 23 July, 1941. 参见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9页。

^④ Martin Jay,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45.

^⑤ 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许俊达、许俊农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38页。

^⑥ 此处的计划是指“权威与家庭的研究”，弗洛姆作为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与霍克海默的冲突是导致项目延迟的重要原因。

^⑦ Horkheimer to Lowental, 31 October, 1942,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7: Briefwechsel 1941-1948*, S.367.

^⑧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241.

体来看，纳粹代表的依然是握有资本的统治阶层的利益。纳粹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他们是资产阶级为了守住自身利益所寻找的新的代言人，也正是在投靠了垄断资产阶级之后，纳粹才一跃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从社会运行机理看，纳粹治下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并未改变。纳粹党是以私人财产占有为基础的，虽然市场经济的影响力受到削弱，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其生产的目的是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法西斯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①

其次，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至新阶段的产物，第三帝国治下的社会呈现出新特点。这种变化显著地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到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国家对于经济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和修正力量。“剥削不再是借助于市场而无计划地再生产，而是借助于有意识的统治……法西斯主义国家中的集中在迅速地进行。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种能够直接掌控社会对立的合乎计划的权力。经济失去了自身独立的动力。它将自己的力量交给了经济上的强人。”^②过去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③由于自由经济原则受到挑战，资产不再是保障私人权力的因素，过去由经济所确立的社会地位转而为国家意志所左右，这也是犹太人地位进一步恶化的原因所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犹太人尚能通过占有财产保全自身，到了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在资产阶级的授意下，为了掩盖劳动契约的真实本质及经济体系的贪婪本性，犹太人成为制造一切社会不公的“罪恶根源”。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化，德国的刑法政策愈发严酷。由于“各种生产体系都力图发现与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刑罚方式”，^④因此纳粹的刑法方式同样应该放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当中来加以理解。一方面，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必须让位于对垄断集团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律和道德分离的原则遭到破坏，“种族优越的生物学观念同德国古典刑法理论的报复原则相混合”，法律失去了保护个人权益的作用，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实现国家惩罚目的的工具。^⑤

再次，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意味着近代以来的启蒙彻底倒退为神话。自启蒙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现代进程，科学技术逐渐拥有了无可撼动的地位，人类的思想信仰随之出现变化。然而在学派看来，启蒙已褪去了其进步性，理性让位给非理性，“已经启蒙的文明在现实中又倒退到了野蛮的状态”。^⑥这一特征在反犹主义中表现得尤为典型。犹太人被认为敌对种族，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生物血统或宗教传统，而更多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因素有关。纳粹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变种，几乎使个人的财产失去了私有属性。个人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政治地位，而非创业能力和个人财富。^⑦犹太人在历经启蒙运动、民主运动、民族运动等思想洗礼的过程中逐渐具有了自我约束的启蒙精神，这种精神在帮助他们跃升为资产阶级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渴望被接纳却不愿意被控制的民族性格。这显然是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的。而对于下层民众来说，他们对生活的愤怒需要得到发泄，统治阶级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这种仇恨转向了犹太人。更为讽刺的是，这一暴行是打着“理性化”的旗号来进行的。在意识形态的宣扬下，犹太人被污名化为经济的操纵者、巫术和血腥的宗教仪式的参与者、杀戮施暴者等，对他们的暴行在名义上是理性化的。因此学派总结道：“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者”，大众的恶行是被“理性”操纵的。^⑧

最后，技术成为法西斯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武器。启蒙和统治的联盟使人们对宗教的真理因素失

① See from Pollock,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X, vol.3, 1941.

② Max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9(8), S.122.

③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④ Georg Rusche &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5.

⑤ Georg Rusche &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pp.179-182.

⑥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⑦ See from Pollock,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X, vol.3, 1941.

⑧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155-156页。

去了意识，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一种宗教的物化形式。^①信仰成为一种文化商品。统治集团利用技术理性固化了对社会的管理。纳粹整齐划一的制服、手势、仪式等都意在促成模仿行为，而这种模仿却是一种技术手段。一般的模仿行为是把外在世界作为内在世界必须努力去遵从的一种模式，纳粹的模仿行为更进一步，将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混为一谈，主体被划入了客体的范围之内，只能服从于病态的、看似符合现实的规律，这为技术的控制扫清了障碍。统治阶级随之借助工具理性达到管理的目的，完成了对人民的控制。在新的社会形式当中，相比以往，技术统治的因素大大增强。希特勒在《德国的广播手册》中就明确讲道：“如果没有扩音器，我们是不可能征服德国的”。^②阿多诺亦指出，“在官方广播中，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③纳粹的胜出不仅是靠枪炮的胁迫，更多是借助技术方式在民意的簇拥中实现的。

四、现代性反思与纳粹研究的关联性认识

对现代性的反思长期以来都是现代西方思想界的重要主题。马克思很早就认识到，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在根本上解决现代性的物化问题。韦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分析，认为工具理性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传统的生活方式及价值模式被以赚钱为目的的现代秩序所取代，在合理化的名义下，资本主义的主体只有经过现代秩序的筛选才能得以持存。^④而当经济危机横扫欧洲、纳粹的屠刀染满鲜血时，现代性的弊病便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在人们面前。在人类思想获得启蒙、行为方式愈加理性化的时代，纳粹竟然会以一种社会性群众运动的方式出现，这直接导致理论界对于整个现代性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对纳粹的思考不应局限于特定时空当中，而是需要放在对整个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中来进行。

法兰克福学派与海德格尔都是纳粹的见证人，但二者对现代性与法西斯主义之关联性却给出了不同的思考。两相比较，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学派的理论站位及学术走向。学派与海德格尔的理论渊源颇深。双方不仅在研究主题方面较为接近，所内的得力干将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在早期思想形成阶段亦深受海德格尔影响，前者更是受到了“真正的具体的哲学”的感召，亲赴弗莱堡师从海德格尔学习。但在对纳粹的性质判断及立场上，双方却站在了截然不同的两端。曾有不少学者否认海德格尔支持纳粹的行为与他本人哲学思想的关联性，但黑色笔记本的发现向世人证明，海德格尔投身于纳粹政府的行为是他做出的自认为符合历史演进的审慎选择。诚如波格勒所言：“当海德格尔在政治语境中寻求做出他的决定时，他自己是在对存在的真理的决定作出定位”。^⑤可以说，海德格尔对纳粹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与其哲学理念具有本质的相关性。^⑥

作为一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政治格局和国家命运是保持关注的，事实上他与纳粹更接近于一种合作关系，而非简单的政治投机。他不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与生活的剥离状态，认为现代文明已经走向衰败，需要“同平庸而腐败的中产阶级世界一刀两断，才能开辟出一条合法的新路”。^⑦海德格尔接受了纳粹对于自身国家社会主义的认定，将纳粹运动这场“伟大庄严的破晓”看作是给整个德国带来的颠覆性革命，从而是拯救西方文明颓势、实现社会总体变革的唯一可能。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文明具有无法自我破解的本质性难题。自柏拉图以来，真理的本质就不再是完满展现的无蔽的本质，真理的

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161页。

② 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③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109页。

④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51页。

⑤ Otto Pöggeler, *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 Stuttgart: Neske, 3. Auflage, 1990, S.324.

⑥ 国家社会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德文皆为 Nationaler Sozialismus，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前者相较后者并不包含极端的种族主义，但鉴于海德格尔对纳粹及反犹的支持，因此在讨论海德格尔思想时将二者作为同义处理。

⑦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张国清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存在取决于人这一“主体”产生有关存在者判断的能力，真理需要借助于一个论断来表述其正确性的模式成了一切西方思想的标准。^①真理被遮蔽导致了本质的虚假性，其后果在于历史只能以一种局部的非本真的状态被呈现出来。人类整体困境的本质性因素被掩盖了，其应对策略事实上无法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②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需要寻找到一种无遮蔽的人与存在之间的全新关系才能解决现代性社会的文明危机，而纳粹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德意志来说似乎是一条合适的道路，它能够借助一种总体性的力量克服对存在的遗忘，从而与虚无主义相对抗，“人们不得不长久地‘坚持’它”。^③

那么回到我们的研究范畴，面对同样的现代性困境，海德格尔与学派为什么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呢？究其实质，大概就在于海德格尔过于专注自身的哲学逻辑理路，将其哲学与现实做了较为生硬的嫁接，并以此作为考察历史的基础，这与学派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及“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的研究路径有着本质差别，结论自然是大相径庭。海德格尔在哲学领域的伟大不会被抹杀，但他这一时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生涩也不应受到忽视。海德格尔一再强调知识与存在的统一，但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他无法识破纳粹树社会主义之形、行资本主义之实的伎俩，也就无法认识到这一社会体制的目的绝不会是推翻当前非理性非本真的社会制度，相反，是为了更牢固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他不同，建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就发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于理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而纳粹对于理性的理解是他人必须对其表示认同和服从。这种所谓的具有普通性的理性同时又是特殊的，它维护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同时因其对否定性因素的无视使得拒不妥协的群体遭到铲除，这种理性本身并不是合理的。^④与海德格尔将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总体性的理性的表达方式不同，在学派这里，法西斯主义在宣判了旧有理性的非理性、强势取代资产阶级过去虚假的理性形式的同时，却只允许服从，不接受反驳，这种“总体性”的社会形势亦是虚假的，必定无法真如海德格尔所愿克服对存在的遗忘，更无法对抗虚无主义、解蔽真理。

纳粹投降之后，研究所这一轰轰烈烈的集体研究项目便不复存在了。但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却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作为世界体系的法西斯主义可能看不到终结。德国纳粹或许被消灭了，但纳粹背后的资本主义体制却不可能从内部瓦解。换句话说，希特勒更像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演员，他只是历史发展倾向的执行者，历史的趋势早于他存在，且在他之后仍将延续下去。^⑤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周宪、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08页。

② Martin Heidegger,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William M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5-55.

③ Karl Löwith,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Stuttgart: Metzle, 2007, S.57.

④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193-195页。

⑤ See from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GS), Band 20:2, Vermischte Schriften I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S:414.